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文库

崇法致公 笃学善行

DUNHUANG TUBOWEN QIYUE WENSHU YANJIU

# 敦煌吐蕃文契约 文书研究

侯文昌 /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文库

崇法致公 笃学善行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11YJC770016)

DUNHUANG TUBOWEN QIYUE WENSHU YANJIU

# 敦煌吐蕃文契约 文书研究

侯文昌 /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 / 侯文昌著.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5. 11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文库)  
ISBN 978 - 7 - 5118 - 8573 - 9

I. ①敦… II. ①侯… III. ①敦煌学—契约—文书—  
研究 IV. ①K87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4986 号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文库

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

侯文昌 著

编辑统筹 政务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张瑞珍

责任编辑 田浩

装帧设计 汪奇峰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吕亚莉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320 千

版本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网址/www. lawpress. com. cn

电子邮件/info@ lawpress. com. cn

销售热线/010 - 63939792/9779

编辑电话/010 - 63938284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 - 62534456

上海公司/021 - 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 - 83072995

西安分公司/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023 - 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010 - 63939781/9782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8573 - 9

定价: 4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 作者简介

侯文昌,1973年1月生,甘肃临夏人,敦煌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与敦煌法律文献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011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3年)各1项。

## 总 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尽管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但在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之下,这一方水土早已过多地与贫瘠、落后相联系。然而,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这里活跃着一支默默奉献的耕耘者队伍,他们热爱法学教育事业,愿意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法学教育尽绵薄之力——他们,是甘肃政法学院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未来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法学教育的繁荣。甘肃政法学院,正是伴随着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的步伐而成长起来的一所高等政法院校,她起始于1956年建立的甘肃省政法干部学校,几经变迁于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普通高等本科院校。近60年的发展历程、30年高等教育的历史积淀与传承,一代又一代的政法人秉承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薪火相传,实现了发展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飞跃。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今天的甘肃政法学院,已经形成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干部培训教育等多层次的办学结构和培养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法学法律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学校目前尚不能与国内著名的法学院校比肩,但是,她毕竟在发展壮大,在向“立足甘肃、面向全国、西部一

流”的目标迈进,并昭示出光明的前景。

在甘肃政法学院即将迎来建校 60 周年之际,学校与法律出版社协商,策划出版了“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文库”。它既是甘肃政法学院当前法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对 60 周年校庆的厚重献礼。其中的著述,或为创新法学理论的学术探析,或为追踪法制实践的实务研判,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不同视角,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求是探理、建言献策。文库是学校法学教学科研人员呕心沥血、笔耕不辍的结晶,展现了甘肃政法学院法学学人思索拓新的积淀。

应该感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由于对社会进步的渴望、对法治的崇尚和追求,才有了中国法学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才有了砥砺催生法学新思想和新理论的沃土和摇篮。我们由衷地期望,“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文库”的出版,能够为学界了解甘肃政法学院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提供一个窗口,能够成为观点碰撞、思想交流乃至学术批评的平台,能够成为促进提高学校科学研究水平的契机。

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多年来关心和支持甘肃政法学院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向为我国法学教育事业奉献着青春、智慧和力量的政法学人表达由衷的敬意!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取得更多、更丰厚的收获;也真诚地祝愿甘肃政法学院以 60 年校庆为契机,以 60 年发展为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谱写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谨以“文库”作为庆祝甘肃政法学院建校 60 周年的献礼!

甘肃政法学院院长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 序

侯文昌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付梓出版了,可喜可贺。

现存我国汉唐时期的契约文书主要保存于出土文献中,汉代契约见于出土汉代简牍中,中古时期契约文书则见于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书等。由于契约文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契约制度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社会经济活动、法律生活等方面,具有弥足珍贵的重要价值,因此在敦煌文书发现之后,对于其中保存的中古时期契约文书的研究就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不管是资料的收集与刊布,还是对于各种类型契约文书的研究,都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然而,相对于敦煌汉文契约文书的研究状况来说,我国吐蕃文契约文书的研究则颇显薄弱,研究者寥寥数人,成果也甚为稀少,甚至于敦煌吐鲁番等文书中其它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如回鹘文、佉卢文等契约文书的研究成果都要多于吐蕃文契约。文昌同志的这项成果,正可对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的研究填补空白。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契约类文献在吐蕃文社会经济文献中仅占一小部分,其数量更是无法与汉文契约文书相比。尽管如此,但与同期汉文契约文书比较来看,吐蕃文契约文书类型齐全,格式较为完整,意思也基本表达清晰,其学术价值

无疑亦很高。作者通过多方检索、裒辑到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约 30 件左右,按照雇佣契约、租佃契约、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的分类顺序依次对各类契约的格式、性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每部分均以史学和法学场域为切入点,以吐蕃文契约与敦煌汉文契约的比较研究为主线,对于每类契约从其表层程式、本身内容、所反映出的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史学、法学价值等方面,细针密缕,抽丝剥茧,层层剖析,并在最后对吐蕃文契约文书进行了整体的分析和概括,得出了符合史实的科学结论。

诚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语言障碍,作者所使用的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皆为王尧等学者汉译后的材料,尚未翻译过来的资料并未利用,这使得本书所研究的某些种类的吐蕃文契约文书材料略显单薄,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还并不足够。然而瑕不掩瑜,诚如作者所言,本书所利用的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在种类上是较为齐全的,所以根据汉译文献也可以对吐蕃文契约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文昌同志原为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经历过历史学、法学良好的教育与熏陶,2009 至 2012 年期间,又跟我攻读敦煌学博士学位,对于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又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与较为严格的训练。文昌同志一贯刻苦认真,兢兢业业,多年来潜心学问,学术功底扎实,学术视觉敏锐,思维创新能力强,毕业后这几年来又不断有新成果面世。愿文昌同志一如既往,在学术的道路上奋进不息,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李并成

2015 年 8 月于西北师范大学



## 前 言

敦煌出土之吐蕃文社会经济文献中，契约类文献仅是其中之一小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学界所能见到的这批遗物共计三十件，其中雇佣契约一件，租佃契约二件，买卖契约六件，借贷契约二十一件。细察之，尽管此类文献数量有限，但其与同期敦煌汉文契约比较而论，类型齐全，程式完整，意思表达清晰，据其可以窥见吐蕃文契约的一般情形。由此而论，这批遗物的发现可以弥补汉、藏文史籍文献记载之缺失，为进一步探究唐代吐蕃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以及民族关系等领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又一批实物资料。

因索取资料之便，吐蕃文契约文书的研究起步于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武内绍人，被誉为“敦煌、新疆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中亚的古藏文契约文书》即是该领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而我国学者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是从搜集、刊布资料开始的，至今仍滞留于汉译与表层考察阶段，有专论者更是凤毛麟角，实乃敦煌界、藏学界之一憾事。

本文对吐蕃文契约文书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概言之，全文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本部分一方面探讨了吐蕃文之渊源问题，即对“印度说”和“象雄说”作扼要介绍，且据目前之资料条件，这一问题迄今仍是不解之谜；另一

方面就中外学界对敦煌吐蕃文资料的搜集、刊布以及契约类文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进而又对吐蕃文契约的资料价值提出了粗浅的看法。笔者意为,吐蕃文契约资料在吐蕃法律史、经济史等研究方面的贡献无以类比,定会有裨益于敦煌学界、藏学界。

第二部分即本文之第一、二、三、四章。本部分依此类文书数量少多为序,分雇佣契约、租佃契约、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四部分,每部分以汉文、吐蕃文契约文书结合与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对每类契约之程式及其蕴含的内容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性考证,在揭示两种文契约异、同之基础上分析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当然,因文书数量多寡不同,各部分之详略亦有差异,但绝非因文书数量有限而简略之,如谈及租佃契约时,尽管仅有二件,但其反映的信息足以能支撑吐蕃文租佃契约之程式、性质等问题之讨论。凡此种种,此处不赘。

总而言之,本文仅是对敦煌吐蕃文契约之探索性研究,《诗经》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能抛砖引玉,当是本文之幸事。

# 目 录

## 绪 论 1

### 第一节 吐蕃文之渊源 1

#### 一、“印度说” 1

#### 二、“象雄说” 2

### 第二节 敦煌吐蕃文文书之搜集与刊布 3

### 第三节 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之研究概况 7

### 第四节 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之资料价值 10

## 第一章 雇佣契约 15

### 第一节 契约之程式 16

#### 一、立契时间 17

#### 二、契约当事人与标的物 19

#### 三、违约处罚条款 19

#### 四、担保及署名 21

### 第二节 契约之性质 23

#### 一、文书雇值缺失的考证 23

#### 二、文本雇值的推测 26

## 第二章 租佃契约 29

### 第一节 契约之程式 33

- 一、关于契首内容 34
- 二、关于租佃标的物 37
- 三、关于租期 38
- 四、关于租佃原因 39
- 五、关于租田人担保 42
- 第二节 契约之性质 44

### 第三章 买卖契约 49

- 第一节 买卖土地契约 49
  - 一、题解 49
  - 二、吐蕃土地买卖法律制度考 52
- 第二节 买卖牲畜契约 66
  - 一、题解 66
  - 二、契约之程式 69

### 第四章 借贷契约 89

- 第一节 有息借贷 90
- 第二节 质押借贷 98
- 第三节 谷物借贷契约 105
  - 一、无息借贷之辨析 106
  - 二、契约之程式 109

结 语 219

附 表 222

附吐蕃文契约录文(汉译文) 227

参考文献 236

后 记 252

## 绪 论

### 第一节 吐蕃文之渊源

吐蕃文作为古代藏民族最早使用之文字,关于其渊源,中外学界有歧义,主要有“印度说”和“象雄说”两种观点。以下扼要述之。

#### 一、“印度说”

持此说的学者们一并认为“吐蕃文(古藏文)是松赞干布时期由吐弥桑布札参照古印度梵文创造的,且千余年来成为学界之主流观点”〔1〕。陈金钟查阅了1981年创刊的《西藏研究》和1988年创刊的《中国藏学》的藏汉文版,两刊截至1988年年底,涉及有关吐蕃文渊源方面的文章共计十三篇,其中吐蕃文源于印度说的8篇,源于象雄说的5篇。〔2〕可见,“印度说”具有优势。究其原因,无论是中原汉地之正史典籍还是西藏史书概有如是之记载。兹举几件材料,如新旧《唐书》载

---

〔1〕 巴桑次仁:《藏文起源探索》,载《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第30页。

〔2〕 参见陈金钟:《藏文渊源研究综述》,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第121页。

“松赞以前吐蕃无文字”〔1〕, P. T. 1287《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赞普传记》载:

吐蕃古昔并无文字,乃于此王(指松赞干布——笔者加)之时出现也。〔2〕

《贤者喜宴》又载:

大臣屯米阿奴之子屯米桑布札,人精明、心底纯正、思维机敏……松赞干布降旨携带黄金、财物等,派往天竺,习学梵天文字,返藏,乃创藏文。〔3〕

当然,持“印度说”者皆反对“象雄说”,理由是“至今为止人们对香(即象——笔者加)雄文的研究和探讨,始终没有发现也没有找到一个充分的无可争议的根据说明确有其文”〔4〕。例如德国藏学家霍夫曼认为:“苯(Bon)在其原始西藏民间宗教阶段,在西藏远比佛教古老,并且它确实具有一种为赎罪和镇魔而同神灵交往的口头经典。在他们自己晚期的著作中,苯波们声称在吞弥桑布札创造藏文以前,苯教是有一种书写体文字,但这的确不是真实的。在现存的书籍中没有这样一种字体的样书留存下来……因而在那时香雄巫师同他们的西藏门徒只能有一种口头文学。”〔5〕

## 二、“象雄说”

此说简言之即吐蕃文是由象雄文演变而来的。此论属于新近出现的一种观点,特别是随着吐蕃苯教研究的兴起而涌现的,认为早起苯教文字即是象雄文,也是吐蕃文之渊源无疑。例如群培多杰认为:“现在的藏文(即吐蕃文——笔者加)和印度文,两种文字的结构、语法基础知识,特别是字体等各个方面,不但根本不

〔1〕《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载:“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2页;《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载:“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19页。

〔2〕《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王尧、陈践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3〕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黄颖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3页。

〔4〕巴桑次仁:《藏文起源探索》,载《西藏研究》1981年第4期,第37页。

〔5〕〔德〕霍夫曼:《关于西藏本教的著作》,载《世界宗教资料》1984年第4期,第22页。

同,而且从吐弥创造藏文过程的历史上去考虑,说藏文是仿照印度文创造的,是不妥当的”,进而指出,“古代西藏在松赞干布统一之前,就已存在一种非统一的文字,即为象雄本之老文,其与松赞时期吐弥桑布札创造的现代藏文作比较,就会清晰地发现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1〕。才让太从语序、构词、虚词等方面将二者比较后亦认为“唯有象雄文才有可能和藏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2〕。

由此看来,吐蕃文之渊源问题短时期内难有定论,要解决之必须要在相关材料上取得突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是“印度说”还是“象雄说”,均承认松赞干布之文臣吐弥桑布札在吐蕃文字发展史上的功绩,认为“藏文是吐弥桑布札对象雄文和梵文经过一番筛选,有所取舍而创制的,它与象雄文和梵文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3〕。因此,经过吐弥桑布札的改造之后,吐蕃文正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此举当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即公元7世纪发生的确信无疑。

吐蕃文自7世纪被创制后历经三次厘定:第一次是从8世纪中期至9世纪初,第二次是9世纪中期,第三次是11世纪初期。〔4〕敦煌出土之吐蕃文文书,绝大部分为7世纪至9世纪之遗物,由此而论,这批文书是自吐蕃文被创制后前两次厘定之际的遗物。这样看来,“这批资料无疑是西藏最早的文字记录,承载了西藏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早期历史即吐蕃历史”〔5〕。

## 第二节 敦煌吐蕃文文书之搜集与刊布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打开后,吐蕃文文书也和其他文书一样难逃厄

〔1〕 参见群培多杰:《藏文渊源初探》,唐景福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第5、8页。

〔2〕 参见才让太:《藏文起源新探》,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140~146页。

〔3〕 参见巴桑次仁:《藏文起源探索》,载《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第30页;才让太:《藏文起源新探》,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142页。

〔4〕 参见金雅声、束锡红:《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2页。

〔5〕 金雅声、束锡红:《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2页。

运,大批流散至国外。据不完全统计,散落在海外的敦煌吐蕃文文书(绝大部分出土于敦煌,但也有少量出自新疆)总数应在六千件以上,主体部分收藏于英国和法国。<sup>[1]</sup>自20世纪20年代起,国际敦煌学界和藏学界开始搜集、整理和刊布流散到英、法的吐蕃文文书,迄今近百年,成果丰硕。以下扼要分述之。

英国收藏品是指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1900~1915年中亚三次考古中获得的吐蕃文文书,总数约有三千五百件。为便于编目,斯坦因将这批文书据内容分为佛教文书和非佛教文书两部分。其中佛教文书,斯坦因邀请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Louis de Vallee Poussin, 1869~1937年)作编目工作(1914年)。瓦雷·普散分律、经及注疏(可考梵文名称者)、经(译自汉文或可考藏文名称者)、经及注疏(未比定者)、怛特罗文书(可考梵文名称者)、怛特罗文书(比定而无梵文名称者)、怛特罗文书(未比定者)、论(可考名称者)、论(未比定者)及藏人著述十个类型编写目录765号。<sup>[2]</sup>非佛教文书则由1903~1927年担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的托玛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1867~1956年)负责整理,但这部分目录一直没有被单行公开出版。自1935年开始,托玛斯将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定名为《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分四卷出版,其中第一卷是从藏文大藏经中辑录并翻译的有关于阆史料,第二卷是按文献内容分为阿柴、沙州、罗布地区、于阆地区、突厥、政府与社会情况及吐蕃军队七个专题刊布了敦煌、新疆出土的吐蕃文社会历史文书;第三卷是对第一、第二卷某些未及展开的问题的补充说明;第四卷是具有藏英词典性质的工具书,收有完备的藏英梵词汇索引。<sup>[3]</sup>

[1] 关于流失海外的敦煌吐蕃文文献的具体数量,学界统计有误差。王尧、尕藏加认为是五千件。参见《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王尧、陈践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尕藏加:《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4期,第49页;荣新江认为是六千件。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金雅声、束锡红认为是八千件。参见金雅声、束锡红:《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5页;樊锦诗认为是一万二千件。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笔者采用荣新江之说。

[2] 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金雅声、束锡红:《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2~3页;房继荣:《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述要》,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152页。

[3] 参见马筑:《国外有关英藏敦煌、和田等地出土古藏文写本的研究》,载《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第85页。



其中第二卷在国际藏学界反响巨大,被誉为“是一部宏伟的资料汇编,同时也可以说是古藏语言学和吐蕃历史学研究的第一次大收获”〔1〕。

“二战”以后,日本也加入了英国收藏品的编目工作,且进展迅速。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学者榎一雄将英藏大部分吐蕃文文书的缩微胶卷购回日本,收藏于东洋文库。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西藏学家山口瑞凤领导的东洋文库研究委员会编撰新的目录,即《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由东洋文库分十二册自1977—1988年间陆续出版。其中1—8册为瓦雷·普散的重新编目,9—12册为瓦雷·普散未收入的文献目录,12册共辑录文献序号1518号。尽管瓦雷·普散目录、托玛斯目录以及东洋文库目录将绝大部分英藏吐蕃文文书公诸于世,但仍有遗漏。紧随前贤,日本另一藏学家武内绍人则完成补漏工作,“共收录以麻札塔格发现的文书为主的360件写本,其中有托玛斯已经录入的45件,托玛斯未涉及而较有价值的60多件,剩下的约总数三分之二的写本多支离破碎,很难辨识”〔2〕。至此,英藏吐蕃文文书辑录工作基本完成。

法国收藏品主要是指伯希和(Paul Pelliot)1906—1908年中亚考古时从敦煌窃取的大量的吐蕃文文书,约有三千件。〔3〕较英藏品而言,法藏品编目工作进展较为迅速。此项工作是由法国藏学家巴考(Jacques Bacot, 1890~1969年)、拉露(Marcelle Lalou, 1890~1969年)共同完成,分别于1939年、1950年和1961年陆续刊出三卷本的《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计第一卷收P. T. 1—849号,第二卷收P. T. 850—1282号,第三卷收P. T. 1283—2216号,还有大量的《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经》文书,计自P. T. 2217—2224号和P. T. 3500—4450号。〔4〕在此基础上,为便于学界检索,1978—1979

〔1〕 [匈牙利]葛萨·乌瑞:《有关怛罗斯战役前中亚史地的吐蕃文文书和文献资料》,王冀、李超译,载《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157页。

〔2〕 房继荣:《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提要》,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153页;杨铭:《英藏新疆麻札塔格米兰出土藏文写本选介》(二),载《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第18页。

〔3〕 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4〕 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梁藏加:《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4期,第50页;金雅声、束锡红:《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3页。